

中亚的伊斯兰极端主义

张 来 仪

【内容提要】 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在塔吉克斯坦反对派联盟和阿富汗塔利班的支持下,于1999年夏天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制造了震惊中亚的“巴特肯事件”。对付宗教极端主义既要开展国际合作,更应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的社会经济问题。

【关键词】 中亚 伊斯兰 极端主义

【作者简介】 张来仪,1962年生,历史学硕士,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广州 510631)

1999年夏天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事件再一次将“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的事实摆在了世人面前。乌兹别克斯坦当局长期标榜的“今夜无暴风雨”的神话被无情的事实击碎了。

其实,早在塔吉克斯坦内战炮声轰鸣之时,敏锐的政治观察家就注意到了气势蒸腾的阿富汗塔利班运动将对中亚国家的影响与渗透。

早期的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身藏不露,人们无法知其真实面目。潜伏在中亚所有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神秘面纱是随着这些新独立国家的政治形势变化而逐渐显现的。复杂、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既是影响政治形势的根本原因,也是包括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内的各种激进思想滋生、蔓延的社会基础。

有理由认为,中亚和高加索一样,已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制造事端的重灾区。所不同的是:在高加索,极端分子是明火执仗,世人皆知;而在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还处在形成期,其政治组织结构缺乏明晰性,甚至不具备社会团体或独立政党的本质属性,有的还属于合法反对派。

一 “巴特肯事件”始末

1999年7月31日,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武装

分子首次出现在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的巴特肯地区。综合各种报道得知:他们是从塔吉克斯坦卡尔姆地区进入吉尔吉斯斯坦的,沿途袭击了一些吉尔吉斯军队的哨卡,但无战果可言。8月6日,吉有关部门开始在扎尔达列村庄和武装分子进行谈判。然而,同意谈判的武装分子竟然有计划地绑架了以巴特肯地区的阿克木为首的谈判小组成员。作为释放这些人质的条件,武装分子要求赎金5万美元(另有资料说是20万美元)。吉政府一面答应他们的要求,一面着手准备消灭他们。据一些和武装分子有来往的当地居民讲,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队伍中,有很多乌兹别克人。这些乌兹别克人自然不打算长期留居在吉尔吉斯斯坦,其最终目的是要进入乌兹别克斯坦¹。

在这种情况下,吉尔吉斯斯坦当局开始采取实际行动以配合乌兹别克军队的进剿。遗憾的是,乌兹别克空军只是根据所谓的“预测”轰炸武装分子的据点,命中率极低,当地居民遭殃不小。狡黠的武装分子便躲进更适合他们活动的山区,利用对他们有利的地形作为掩体进行重新部署。

为了夺回并重新控制巴特肯地区,吉尔吉斯

¹ 参见常庆:《宗教极端势力与中亚地区安全》,《国际观察》2000年第4期。

斯坦官方动用了国防部、内务部、国家安全部的数百名官兵开进事件发生的地区。

1999年8月23日,政府组织的联合部队从扎尔达列村庄撤走后才几个小时,武装分子就又卷土重来。这次,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部队的人数更多,因为从“帕米尔党”中分离出来的“穆雅赫特”的150~200名成员加入了武装分子的队伍。两天之后,他们又故伎重演,绑架人质,将4名日本地质学家及其翻译、吉尔吉斯内卫部队司令沙姆盖耶夫少将及陪同的当地一名警察中校悉数扣押藏匿¹。

在11月中旬,100多名武装分子向在锡尔居民点的政府军发动偷袭,遭到政府军的猛烈阻击,武装分子死伤15人。然而,训练有素的武装分子将当地居民作为掩护自己逃跑的“活体盾牌”。政府军一直追至吉乌边界。国界线外就是塔吉克斯坦的吉尔卡达洛地区。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合理地请求塔吉克斯坦军方采取行动消灭武装匪徒。但是,该地区却处在塔吉克反对派的控制之下,当地的负责人只服从塔吉克斯坦反对派联盟领导人的命令。后来,人们知道了事情真相:攻击吉尔吉斯斯坦的伊斯兰武装分子正是在这里得到了帮助和支援。他们把自己队伍中的病员送到吉尔卡达洛地区的医院进行治疗,甚至有些伤病员还被送往杜尚别的医院。

在吉尔吉斯斯坦当局和塔吉克斯坦反对派联盟谈判,以及与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接触后,伊斯兰武装分子于1999年10月18日释放了沙姆盖耶夫将军;不久,日本地质学家也获得了自由。一系列的事实说明,以伊斯兰复兴党^④为核心的塔吉克斯坦反对派联盟和阿富汗塔利班正是这伙极端分子的幕后支持者。

巴特肯地区发生的事件表明:中亚地区的形势是不稳定的。有关国家如果不在塔吉边界和吉乌边界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突发事件还有再次发生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巴特肯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而是中亚地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尖锐化和地区小气候与国际气候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首先,塔吉克斯坦发生的派别冲突具有不确定性。其次,中亚各国的经济社会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再次,中亚的邻国——阿富汗塔利班的政治军事力量迅速

膨胀。塔利班与中亚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着极其密切的利害关系,形成了相互支持的态势。第四,从阿富汗“金新月”到俄罗斯、欧洲的毒品通道必须经过中亚地区,控制了这条通道就意味着控制了一个取之不竭的财源,因此,中亚地区的各派政治极端主义力量对这条通道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也是酿成中亚新冲突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月事件^⑤之后,塔什干当局逮捕了一批长期潜伏在地下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审讯后得知他们就是活动在塔吉克斯坦反对派联盟控制下的吉塔边界地区。这些乌兹别克斯坦的反对派正是在争夺“毒品之路”的控制权的较量中登台亮相的。

乌兹别克斯坦当局在1999年2月事件和塔什干的一些地方发生恐怖活动之后,才不得不承认反对派存在的事实。几乎与此同时,联合国难民事务署高级专员的代表在塔吉克斯坦宣布:在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加尔姆西风(中亚热风)”组织拥有1500名左右的武装成员。这些人离开乌兹别克斯坦的原因是遭受了政治迫害。他们之所以不想返回祖国是担心回去后受到当局的严厉惩罚。乌兹别克斯坦的反对派说,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监狱里关押着许多无辜者。这些所谓的犯人是由于宗教信仰问题而被捕的,并遭受着司法机构的虐待。

二 塔吉克斯坦反对派联盟麾下的乌兹别克纵队

以智·拉马洛卡宁为首的乌兹别克反对派接二连三地袭击巴特肯地区的村庄,引起了中亚舆论的注意。塔吉克斯坦反对派联盟的负责人德·阿波托洛·卢尔于1998年2月发表声明说,塔吉克斯坦反对派联盟的武装力量已经像政府军一样,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在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野战部队指挥官都听从最高领导人的命令,尤其是智·拉马洛卡宁。按照卢尔的话说,拉马洛卡宁和自己的部队一起已经离开了乌兹别克

¹ 比比科娃:《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侵袭》,载《俄》《今日亚非》杂志2000年第2期。

^④ 张来仪:《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复兴党》,《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4期。

^⑤ 1999年2月16日,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塔什干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针对总统的系列爆炸案,造成15人死亡,128人受伤。

斯坦。但在该地区当了9天俘虏的乌兹别克登山队员驳斥了卢尔的声明：拉马洛卡宁将他们关押在位于吉尔卡达洛的一个基地。也就是说，这些人仍在塔吉克斯坦的东部和吉尔吉斯斯坦相毗邻的两国边界地区活动。

笔者认为，卢尔的声明很可能是想洗刷支持乌兹别克反对派的不义之名。尤其是在塔吉克斯坦总统和议会选举的前夕，当局和反对派都在向互相妥协、迁就方面迈出重要、积极的步伐。反对派只谈“有人反对和解”的问题，而对于塔吉克斯坦反对派联盟的武装力量和政府军一体化的重大问题则一直采取避而不谈的策略。可见，从前的武装分子在选举时变换了自己的主张，将自己打扮成共和国的“良民”。实际上，塔吉克斯坦的武装分子在向游击战方面转变，特别是在北方地区，反对派一直成功地保持着自己的影响。依靠传统的氏族部落制度，很多武装分子白天化装成普通百姓，而在晚上参加游击战斗。这种战术能够使他们保存自己的力量直到夺取胜利。作为塔吉克反对派一翼的乌兹别克武装分子得到了边界地区的物资补给和阿富汗塔利班的支持。

卢尔不止一次地发表声明，企图和袭击巴特肯地区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划清界线。他亲自向拉马洛卡宁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要么交出武器，要么离开塔吉克斯坦的领土。笔者分析，此举似乎不真实，带有为“竞选”造势的烙印。卢尔把自己打扮成“调停人”的形象。但不管怎样，塔吉克反对派联盟中的乌兹别克武装分子没有在塔吉克斯坦的地方选举中制造麻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离开了社会政治舞台，只是“突围”到了邻近的吉尔吉斯山区。在这里他们能够等待到对自己有利的时机，从复杂的局势变化中寻找一条合适的出路。需要说明的是，拉马洛卡宁及其属下的战地指挥员拒绝接受政府和反对派联盟于1999年6月17日签署的《关于非法武装组织解散和缴械的议定书》。穆劳·乌马尔、朱纳杜劳指挥的“沙伊哈”、“沙哈”和其他战斗部队转移到了自认为最安全的塔维达尔、萨林达什特、塔朱果巴特、朱尔卡达洛和浩伊特地区，以便在这些地方保存实力，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显然，在巴特肯事件期间，从军火仓库所在地萨伊特、丘萨洛及其他地区到吉尔吉斯斯坦南部

的通道十分畅通。大量的武器弹药、食品药品、棉衣棉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武装分子的手中。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1999年9月初，在伊列哈洛别克的指挥下，从塔吉克斯坦为在巴特肯地区滋事作乱的伊斯兰武装分子送来了一大批弹药，在塔吉克反对派联盟派出的向导队的带领下，军火运输队平安地通过了吉塔边境地区。正是利用塔吉克反对派联盟控制下的这些通道，反对政府的乌兹别克伊斯兰激进分子和阿富汗塔利班组织建立并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

在中亚地区猖獗活动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不仅接受了来自高加索地区的援助，巴特肯事件的高加索背景已经没有异议；而且还得到了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的有力支持。根据独联体有关部门的监测，中亚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经常接收来自阿富汗的无线电信息。事实证明，塔吉克斯坦的反对派、阿富汗塔利班的代表与拉马洛卡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相互配合行动。

1999年8月24日，当伊斯兰武装分子占据了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扎尔达列村庄后，马上和自己的老巢——塔吉克斯坦的浩伊达进行联络。在和吉尔吉斯斯坦有关方面进行谈判时，伊斯兰武装分子非常重视浩伊达的指令：“应当将俘虏扣留到最后一刻钟，因为有他们在，‘异教徒’的轰炸就会有所收敛。尤其是一些有价值的人（沙姆盖耶夫将军和日本人）对我们非常重要。”

从乌兹别克斯坦执法机关公布资料中得知，塔吉克斯坦反对派联盟麾下的乌兹别克纵队的军事领导人拉马洛卡宁向塔吉克斯坦反对派联盟的军事指挥官穆·兹耶夫（1999年秋季开始在拉赫莫诺夫政府中担任特殊事务部部长）汇报情况。同时，伊斯兰武装分子还和阿富汗喀布尔和坎大哈建立了联系，有一些特殊的信使在阿富汗和中亚之间传递着绝密情报。吉尔吉斯斯坦的情报机关“哈巴尔”指出，在一次消灭非法匪徒的战斗之后，发现了一系列档案材料，其中就有伊斯兰教书籍以及用特殊方式装订成册的组织恐怖活动的计划、队员名单、作战指令、山区作战指挥训练大纲（包括军事部署和战略战术）。这些高水平的作

¹ 比比科娃：《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攻袭》，载《俄》《今日亚非》杂志2000年第2期。

战文件显然是在巴基斯坦制定的。总之,一系列的事实说明:中亚伊斯兰武装分子的战斗计划的拟定和部署是在位于中亚地区之外的司令部进行的。此外,沙特阿拉伯等国的有关组织向中亚派出了许多受过专门训练的传教人员,传播伊斯兰教教义,免费赠送、散发《古兰经》,并出资收买当地居民做代理人,物色骨干赞助出国朝觐,还为出国参加军事和宗教训练的人员提供经费¹。可见,中亚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有着极为复杂的国际背景。

三 谁是乌兹别克纵队的首领

巴特肯事件发生之后,以武装分子为骨干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形象越来越令世人反感。据目睹过事件过程的吉尔吉斯村民讲,其队伍成分复杂,除了乌兹别克人之外,还有塔吉克人、阿富汗人和阿拉伯人。

乌兹别克反对派的首领叫朱马巴伊·阿赫马德洛维奇·浩吉耶夫,外号叫“拉马洛卡宁”,出生于拉马洛卡宁地区的名叫“浩吉”的村庄。他作为空军陆战队员曾在阿富汗打过仗。在拉马洛卡宁地区还有两个乌兹别克反对派最著名的人物:阿布杜洛瓦宁·尤洛达什耶夫(后来改名为阿布杜拉兹)和达吉尔·尤洛达什耶夫,他们是“吉哈德”(“圣战”)组织领导人。根据乌兹别克斯坦情报机关的资料,他们创建该组织的目的是要推翻乌兹别克斯坦现任总统卡里莫夫的统治。拉马洛卡宁早在 1987 年在费尔干纳盆地活动时,就成为国际伊斯兰极端分子所瞩目的焦点人物。此时此地他们找到了试图建立伊斯兰政党的理想地点。在 1992 年,在这里成立了军事化的组织“托乌巴”(从《古兰经》第 9 章的阿拉伯语“忏悔”一词而得名)。阿·尤洛达什耶夫和达·尤洛达什耶夫是该组织的第一批成员。后来,从空降兵部队复员的朱马巴伊·浩吉耶夫加入了该组织。“托乌巴”的初期成员大都是被追捕的一些犯有刑事罪行的危险分子。乌兹别克斯坦当局的围追迫使阿·尤洛达什耶夫和浩吉耶夫来到了塔吉克斯坦,他们在塔吉克反对派联盟的队伍中找到了避难所。朱马巴伊·浩吉耶夫因有过硬的军事战斗本领引人注目,甚至被派往阿富汗,在位于昆都士和达哈尔的兵营接受特殊的训练。之后他作为一名冷酷无情

的伊斯兰激进主义战士回到了中亚。

与此同时,留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达吉尔·尤洛达什耶夫从事未来的战斗队员的招募工作。到了 1997 年,从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和塔吉克斯坦招来的 300 多人(大多数是 28 岁以下的年轻人)被派往在阿富汗的军事教导营接受军事训练。由于中亚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这些年轻人失去了学习或工作的机会,极易轻信伊斯兰激进组织蛊惑人心的宣传。

从阿富汗回来后,朱马巴伊·拉马洛卡宁(现在叫浩吉耶夫)在塔吉克斯坦创建了自己的营地,他的队伍中既有乌兹别克的宗教极端主义者,也有来自国外的穆斯林雇佣军。起初,拉马洛卡宁在塔吉克斯坦反对派联盟麾下参加反对塔吉克政府军的战斗,但是,现在的塔吉克反对派极力与自己原先的“同志”划清界线。可以确定的是:拉马洛卡宁之所以加入塔吉克斯坦反对派联盟,只不过是為了分享抢劫和毒品收益等经济上的好处。特别是他帮助和杜尚别当局进行斗争的塔吉克军队的叛变上校夫多谢尔丁耶夫的举动更能说明这一点。顺便提一下,塔吉克斯坦当局认为,这个叛官隐藏在乌兹别克斯坦。

从 1997 年 1 月起,接受过达吉尔和阿布杜拉兹特别培训的人开始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土地上从事杀人放火、半路抢劫等强盗活动。在一次由当局发起的剿匪战斗之后,阿·尤洛达什耶夫及其战斗队员经过奥什地区的卡达穆兹、乔拉伊等地跑到了塔吉克斯坦。在塔吉克的卡达姆兹地区与拉马洛卡宁的队伍会师。这正是他们打算在费尔干纳盆地建立伊斯兰飞地思想的基本成熟时期。

这些人认为,在中亚建立伊斯兰国家的计划一出笼就能得到国外伊斯兰激进组织的金钱援助。这些人之所以首先选择费尔干纳盆地是由一系列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经济特点所决定的。这里是中亚宗教氛围最浓烈的地区。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安全机关指出,在费尔干纳盆地建立伊斯兰飞地只是中亚伊斯兰极端分子整个行动计划中的第一站,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把整个乌兹别克斯坦变成伊斯兰神权国家。逃亡土耳其的乌兹别克

¹ 潘志平:《中亚伊斯兰复兴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西北史地》1998 年第 2 期。

斯坦警察穆罕默德·萨宁赫是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坚定支持者。在塔什干,有人指责塔吉克反对派联盟麾下的乌兹别克纵队鼓励在乌兹别克国内进行破坏活动,并将1999年在塔什干发生的财政危机归咎于他们。

中亚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从土耳其、经过哈萨克斯坦再到费尔干纳盆地,建立了一条通道。他们的许多文件是在土耳其印制的,甚至有人说他们还能印制货币。有迹象表明,正是通过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激进主义武装分子与车臣分离主义分子建立了联系。在车臣专门建立了“乌兹别克阵线”的军事技术训练营地。从中亚国家来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在此接受战斗经验十分丰富的车臣指挥员的教导。

据说,建立在比什凯克和杜尚别的商铺和赌场是乌兹别克斯坦武装反对派的经费来源之一。这些地方不同于乌兹别克斯坦,对娱乐活动较为宽容。

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得到了当今世界最大的恐怖分子本·拉登的所谓“慈善”款项。据一些外国报刊资料讲,拉登每年拨出2.5亿美元支持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反对派。拉登委托约旦人阿布·苏哈伊布·阿里·阿洛林亚充当他与中亚伊斯兰极端分子之间的联系人。还有从阿富汗回来的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激进分子阿布·朱赫达洛也被认为是本·拉登的人。巴特肯事件之后,国外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日趋活跃,该组织的积极分子多半在阿富汗和土耳其,其第二号领导人祖巴伊尔·伊本·阿布杜洛·拉赫穆甚至专门发表声明说,他们的组织将采取劫持人质的方式,让全世界知道卡里莫夫的武装反对派。他在谈到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的经费来源时说,可以从乌兹别克侨民,尤其是布哈拉埃米尔后裔的资产中得到资助。

1999年9月初,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政治委员会的主席祖巴伊尔·伊本·阿布托洛在巴基斯坦《明镜报》上发表了《致吉尔吉斯斯坦当局的公开信》。信中写道:“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的埃米尔和英特日赫特力量的统帅穆罕默德·达赫尔于伊斯兰教历1420年(1999年)8月25日正式宣布向塔什干的社会制度开展圣战。伊斯兰运动毫不隐瞒自己的目的,即在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伊斯兰神

权国家;抢救出卡里莫夫审讯室中关押的近5万名穆斯林兄弟。”与此同时,伊斯兰运动促请吉尔吉斯斯坦当局不要阻挡乌兹别克战士为了伊斯兰教信仰而进入乌兹别克斯坦的通道;不要帮助犯有反对伊斯兰教罪行的塔什干当权者。

在1999年10月底,祖巴伊尔·伊本·阿布杜洛·拉赫穆参加了由吉尔吉斯国会议员在比什凯克举行的电话新闻记者招待会,在回答有关运动的目的时说,“伊斯兰运动坚决进行反对塔什干当权者的斗争,直到乌兹别克斯坦完全按照伊斯兰沙里亚法生活为止。”

乌兹别克当局认为,伊斯兰极端分子计划采取大规模的行动来推翻卡里莫夫的统治。1999年2月的事件只是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大规模行动之前进行的一次前哨战。达·尤洛达什耶夫此时在塔利班的支持下进入了乌兹别克斯坦。他马上将铁尔梅兹地区的部分武装力量吸引到了自己周围。此后,拉马洛卡宁和尤洛达什耶夫的队伍在塔吉克反对派联盟力量的支持下,通过费尔干纳盆地来到了巴特肯、阿拉斯克地区。在这些距离首都塔什干不再遥远的地方,一些自称为瓦哈比教派的传教人员已经被穆斯林拥戴为宗教领袖^④。

塔什干二月事件标志着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斗争在乌兹别克斯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局现在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将在国家独立时提出的恢复伊斯兰传统价值观与同伊斯兰极端分子进行斗争有机地协调起来。

四 伊斯兰教在乌兹别克斯坦

应当指出,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地区最伊斯兰化的国家。这是由历史因素所决定的。在乌兹别克斯坦这片土地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伊斯兰国家——布哈拉埃米尔国、浩罕汗国和希瓦汗国。当局期望通过强调民族特点和苏维埃政权时期的国家管理的传统权威来治理国家。但是,在乌兹别克斯坦,民族成分复杂,各民族的土地犬牙交错,因此,只是依靠民族主义的原则,很难建立起一个

¹ 比比科娃:《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侵袭》,载《俄》今日亚非》杂志2000年第2期。

^④ 许涛:《关于中亚地区伊斯兰运动问题》,《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3期。

社会稳定的平台。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教也许比民族主义更有意义。它能发挥维护国家完整统一的作用。乌兹别克斯坦居民表现出的保守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宗教和民族传统的保留。卡里莫夫总统说,全国 82% 的居民信仰伊斯兰教。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的资料,到 1999 年 8 月底,在共和国登记注册的宗教团体 1 710 个,其中的 566 个是属于伊斯兰教的。处于指导地位的伊斯兰宗教学校是拥有 750 名大学生的伊斯兰最高学府。成百上千的乌兹别克青年人接受了伊斯兰宗教教育,有的还去国外的伊斯兰宗教学校学习。学成之后,他们大都成为正统伊斯兰教(逊尼派)的传播者。他们极力反对伊斯兰教的地方化和宗教仪式的特殊性,以及与此相连的在中亚地区保留的前伊斯兰教的传统仪式,即反对苏非主义神秘团体的宗教理论和实践。传统的伊斯兰宗教界称国外伊斯兰学校的毕业生和在独联体活动的伊斯兰教特使及其追随者为“瓦哈比派”。该派是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主要力量,活动猖獗¹。

为了将“瓦哈比派”活动限制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内,卡里莫夫总统于 1999 年 9 月颁发了关于建立一个由地方宗教导师执教的伊斯兰神学院的命令。在乌兹别克斯坦,就像中亚其他国家一样,近年来出现了很多清真寺,但其活动始终处于当局的监督管理之下,最近清真寺的建立速度有所减慢。在这种情况下,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宗教界担心伊斯兰教的正统派和激进派之间发生冲突,便发表了支持政府的声明。共和国的宗教管理机构发表了好几个谴责“瓦哈比派”的文件。其中严正指出,“乌兹别克伊斯兰武装分子的行为是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帜反对《古兰经》。”

乌兹别克斯坦的媒体小心谨慎地表明立场,尽量避免触及读者的宗教情感。例如,《人民之声》报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行动确实是要建立伊斯兰国家吗?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建立国家是伟大的事业,只有伟大的人物和人民一起才能实现这样的崇高目标。”报刊大都回避提及伊斯兰运动。吉尔吉斯南方的事件被说成是贩毒组织的行动。卡里莫夫总统在接受莫斯科的一家报纸采访时说,乌兹别克斯坦绝对不是伊斯兰武装分子攻击的目标。言下之意是:吉尔吉

斯斯坦当局为了应付国内的紧张形势,需要这种夸张性的说法。但卡里莫夫本人也承认,乌兹别克斯坦处在恐怖分子的兴趣范围之内,“匪徒不只是在(1999 年)8 月份通过了吉尔吉斯边界,他们平安地从塔吉克斯坦经过吉尔吉斯斯坦到乌兹别克斯坦来回往返已经两年了。这些匪徒的袭击大都发生在我们身旁。我们在浩罕、阿洛吉扎、拉马洛卡宁等地找到了成吨的爆炸物。”

众所周知,“伊斯兰因素”的潜在危险性早在苏联时期就有人关注了。遗憾的是,新独立的中亚有关国家的当权者好像没有想到伊斯兰激进分子会出现在社会政治的前台,缺乏足够的警惕性,经常和伊斯兰教打得火热,极力和宗教活动家亲近。

然而,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的特点是正统派(逊尼派)和苏非派同时传播,甚至是两位一体。非官方身份的谢赫、辟尔等宗教人士,数目众多,在信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们在事实上不受政府的监控。中亚的苏非派伊斯兰教还有第二个名称——“民间伊斯兰教”。

应当指出,伊斯兰极端分子对吉尔吉斯政府的要求比较少,构不成严重挑战。吉尔吉斯的伊斯兰教和哈萨克的伊斯兰教一样,完全不能属于“纯洁的伊斯兰教”,而是吸收了大量前伊斯兰文化成分的、在游牧民中间广泛传播的“民间的伊斯兰教”。当局用在费尔干纳盆地近年来建立的 1 200 多座清真寺来证明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然而,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的政治空气不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形势相提并论。尽管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存在着一系列由于社会经济形势恶化而引发的棘手问题,但国内的社会舆论和国际舆论一样,都认为,在中亚地区,阿卡耶夫总统的统治方式是最民主的。他没有去交涉乌兹别克领导人对自己所谓的“自由主义言论”的指责。当然,比什凯克的宗教宽松政策并不意味着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威胁不现实,而是当局尽力避免刺激它爆发。这种不诱发策略比较明智。

原苏联中亚共和国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官员的贪污腐化、侵吞国家财产、有组织的犯罪及黑社会向政府机关的渗透等等阴暗面已不是什么秘

¹ 邓浩:《伊斯兰瓦哈比教派与中亚政局》,《现代国际关系》1999 年第 7 期。

密。凡此种种,不仅使政府难堪,而且引发了人民的不满情绪,反对派运动事实上遭到了无情的镇压,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通常都被宣布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应当承认,伊斯兰教反对派在中亚(尤其是在乌兹别克斯坦)有着巨大的影响。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与当权者事先没有明确的对策有关系。独立后的中亚国家大都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口号,在此情况下,只有高喊“伊斯兰”口号的伊斯兰反对派才能在社会上赢得广泛的认同,得到国外伊斯兰国家的财政援助。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塔吉克斯坦的民主主义者向伊斯兰教的接近和靠拢。官方(包括宗教界)坚持不同那些号召“纯洁伊斯兰教”的激进派进行对话,但又不能有效地和官员贪污、集团犯罪作斗争。结果是伊斯兰教没有成为政权的同盟者,尤其是在塔吉克斯坦,伊斯兰教成为同当权者进行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在政教关系方面,具有一定权威的乌兹别克政府有可能在政治上利用宗教。还应当承认,卡里莫夫的强有力统治,是乌兹别克斯坦能够制止伊斯兰激进主义蔓延的主要因素。乌兹别克斯坦的安全机关成功地消除了居民在各个方面表现出的不满情绪。在分析乌兹别克的形势时,巴基斯坦的《明镜报》写道:“说实话,任何一个政权都有反对派,但塔什干当局面对的反对派是那样的复杂,在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统一体中,包含着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思潮。”

五 对 策

笔者在研究中亚动荡不安的局势时发现,军队的职能未能很好地发挥,军方在维护国家稳定方面几乎是无所作为。

在苏联时期,在奥什驻有特种战斗部队,专门进行山区作战训练。这支山区战斗队后来作为“苏联遗产”划入吉尔吉斯斯坦的军队,但其战斗力已是今非昔比。共和国内卫部队司令当俘虏这一事实说明军队的战斗力是多么的虚弱。据说将军被俘是由于没有随身的通讯联络工具,不得不向附近的日本地质学家求助。就在此时,他们一起成了俘虏。

吉尔吉斯斯坦军队领导层对武装分子突破防线进入共和国领土十分着急。在国防部的会议上

有人指出,拒绝承认俄罗斯边防军的职责、吉尔吉斯斯坦的财力和军力不足是武装分子如此野蛮地渗入国家纵深地区的原因。甚至有人说,这只是前哨战,将来很可能有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按照有关在防卫方面相互支援的协议,邻国哈萨克斯坦政府给吉尔吉斯斯坦提供了军事技术、通讯工具、炮兵和空军的弹药等援助。1999年8月28日,在奥什举行了有中亚4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就协同消灭恐怖组织行动方面交换意见,决定建立一支隶属于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的、由4国精干军人组成的部队。从9月中旬开始,为数众多的边防军加强了检查,在边界及其附近地区建立固定的换防制度。吉尔吉斯斯坦对所有有战斗经验的后备人员进行了战争动员。在奥什地区加强军事工事建设,并由从阿富汗回来的军人组成自卫部队,形成了一支由护林员、狩猎专家和猎人组成的志愿部队。

1999年11月初,当哈萨克“远征”引起争议的时候,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出席了塔什干的咨询会议,谢尔盖耶夫的访问表明了俄罗斯关注中亚局势。这次访问对于加强俄乌关系具有重要意义。1999年5月,塔什干宣布退出集体安全条约体系;俄吉军事合作也有所削弱,比什凯克曾出现怀疑俄罗斯边防军职责的情绪。因此,谢尔盖耶夫的访问可以看作是俄罗斯恢复与中亚传统关系的第一步。俄罗斯在中亚南部地区的军事存在很可能进一步加强。

有迹象表明,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威胁促进了中亚各国军队部门的领导人协调行动,可以预料,吉尔吉斯斯坦加入1998年5月的俄塔条约和恐怖分子进行斗争,因此,军事合作客观上为俄罗斯在中亚恢复影响创造了条件。莫斯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经济影响的能力。但中亚局势的变化给俄罗斯提供了通过军事存在恢复影响的可能性。俄罗斯将考虑提供适当的军事援助或者派遣自己的军队。俄罗斯当前的任务是镇压分离主义和在北高加索消灭伊斯兰极端主义。然而,哈萨克斯坦的报纸《全景报》写道:“现在的俄罗斯军人能够赢

¹ 比比科娃:《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侵袭》,载《俄》《今日亚非》杂志2000年第2期。

回许多从前失去的东西”。具有地区领袖身份的卡里莫夫总统也表示愿意让俄罗斯军队回到中亚。可在 1991 年,在乌兹别克斯坦独立的整个过程中,俄罗斯被当成是中亚国家经济形势恶化的肇事者。因此,乌兹别克的领导人试图请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给以某种形式上的帮助。卡里莫夫总统在 1999 年 4 月举行的纪念北约成立 50 周年大会上,要求与其在和平与安全事务方面进行合作,共同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禁止武器、毒品贩运。

然而,邀请美国军队介入中亚事务定会引起伊斯兰极端分子更大的反弹,尤其是阿富汗的塔利班。这是塔什干当局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为了中亚地区局势的稳定,塔什干曾经下赌注支持阿富汗战地指挥官、乌兹别克人杜斯塔姆。此人后来在塔利班的压力下逃亡国外。乌兹别克当局未能与塔利班搞好关系。所以不得不参加俄塔联盟,保持和马苏德(阿富汗的塔吉克人领袖)的关系。与此同时,塔什干仍然试图与塔利班建立良好关系。1998 年 8 月,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举办了“阿富汗之友”活动,显然是想通过游行示威引起人们对阿富汗问题的注意和博得塔利班当局的好感。

俄罗斯采取各种措施提高自己在中亚的地位,俄国防部长访乌时答应提供武器和服装。吉尔吉斯斯坦也得到了俄罗斯高达 100 万美元的军事技术援助。

目前,中亚民众,尤其是首都居民认为,中亚国家之间没有相互配合的协调行动和专门的组织措施将很难对付伊斯兰极端主义,形势将进一步恶化。1999 年 10 月底,哈、吉、乌、俄 4 国联合举行了“南方之盾”的军事指挥演练,其目的是在反对民族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协调行动。

2000 年 5 月 18 ~ 19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进一步讨论了俄罗斯与中亚的军事技术合作事宜,俄乌准备采取预防措施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俄罗斯甚至扬

言要对阿富汗塔利班实施预防性打击。

伊斯兰极端主义(通常称为“瓦哈比派”)的武装分子组织新进攻的威胁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土地上并未消失,这就意味着地区紧张局势长期存在,直到伊斯兰极端主义失去自己存在的基础之前。

目前,伊斯兰极端主义仍然是中亚地区的主要威胁。甚至有观察家说,中亚事态很可能像达吉斯坦那样发展。如果将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事件和达吉斯坦事件相比较,就会发现很多相似之处。乌兹别克的伊斯兰极端分子跑到了塔吉克斯坦山区,得到了塔吉克斯坦反对派联盟的帮助,达吉斯坦的“瓦哈比”派隐藏在车臣,同样得到了支持。他们都在为了“吉哈德”(圣战)而积聚力量。事实上,高加索的分离主义者和中亚的极端主义者之间早就存在着密切的合作。他们同在外国的伊斯兰培训中心学习,在靠近切林和布哈拉的清真寺里从事训练。在被称为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教中心的拉马洛卡宁地区的一个清真寺里,来自车臣的著名神学家萨洛马卢·拉托耶夫在讲经。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也承认自己国家的 60 名公民在达吉斯坦站在分离主义分子方面作战。法国研究中亚问题的学者奥宁夫·卢瓦认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在达吉斯坦和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之间虽然没有组织方面的联系,没有共同的领导,只有配合行动,然而,他们都得到了在阿富汗取得战斗经验的人的帮助,都将伊斯兰激进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卢瓦还说,他们都赞成输出伊斯兰革命。

在中亚和高加索猖狂活动的伊斯兰武装分子得到了国际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所以中亚国家加强与俄罗斯、中国等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不失为对付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有效途径。但问题的根本解决主要取决于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化程度和政治精英分子团结全国民众的能力。当务之急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找到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

(责任编辑 刘庚岑)